

农村老人抑郁自杀的社会原因及应对策略

郑文文

(福建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在梳理老年抑郁症和农村老人自杀的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通过深度剖析农村老人抑郁自杀的个案, 揭示农村社会代际变迁、社会公共服务欠缺和乡村传统文化没落的问题, 最后提出重建人们道德意识和责任感、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建立专业化社会服务机构的策略。

关键词: 农村老人; 抑郁症; 自杀; 代际关系; 传统道德

中图分类号: C91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0)06-0043-06

Social factors causing the rural elderly depression and suicide and its related countermeasures

ZHENG Wen-we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ated literatures of the rural elderly depression and suicide, this article traces a case of a rural old man's suicide and explores the reasons causing this phenomenon, which are the change of generation relationship, the backward of public service and the decay of traditional moral. Hence, the paper raises some suggestion as to improve rural pension system and build professional social services agency.

Key words: the rural elderly; depression; suicide; generation relationship; traditional moral

一、问题的提出

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 主要表现为情绪低落, 兴趣减低, 悲观, 思维迟缓, 缺乏主动性, 自责自罪, 饮食、睡眠差, 担心自己患有各种疾病, 感到全身多处不适, 严重者可出现自杀念头和行为。据有关调查显示, 我国抑郁症发病率约为 3%~5%, 目前已经有超过 9 000 万人患有抑郁症。但由于“抑郁症”这一术语无论是在精神病学还是心理学领域, 从西方引入我国的时间不长, 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其比较陌生, 因此, 与高发病率形成鲜明反差的是, 目前全国地市级以上医院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到 20%。在农村, 由于观念和认识的限制以及经济、医疗卫生条件的制约, 农民对抑郁症的概念更加陌生。因此, 老年农民群体即使出现抑郁症的症状, 村民不知道主动求助专业医生, 仅想当然地理

解为“人老了就那样”。如此一来, 大量患有抑郁症的农村老人缺乏应有的关注, 他们在极端情况下往往选择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可见, 农村老人抑郁症及自杀现象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学界关于农村老年抑郁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老年抑郁症的发生机率及影响因素方面。如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胡志等 2009 年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 安徽农村老人抑郁症患病率达到 5.9%, 比前些年调查的 5.1% 的患病率有所上升。调查还发现, 经历过健康恶化、经济困难、亲友去世、财物损失、亲友冲突、恐怖经历和其他不愉快经历等 7 种负性生活的农村老人, 除财产损失以外, 其他 6 种都与老人抑郁症的发生显著相关。在对老人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 6 项常用代表性指标的调查发现, 能否完成洗澡、穿脱衣服、上厕所、上下床、吃饭、室内活动等, 对老人抑郁症患病率有显著影响^[1]。或许是样本选择的偏差, 南华大学龙理良等对湖南衡阳农村社区中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的调查结果表明, 衡阳市农村社区老年人抑郁的总发生率

收稿日期: 2010-11-25

作者简介: 郑文文(1985—), 女, 山东济宁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发展社会学。

高达 32.68%，男性为 25.65%，女性为 44.35%；老年女性抑郁发生率显著高于男性^[2]。这类研究缺少对因抑郁症引发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的进一步分析。

关于农民自杀现象的研究成果较多。大部分学者是基于费孝通早年提出的“代际关系”的角度对农民自杀行为加以分析的，再根据实际调查验证他的这种理论。费孝通提出了代际关系中“反馈模式”和抚育与赡养之间的关系平衡问题，认为对父母的赡养既包括生活上的照顾，又包含精神上的慰藉^[3]。沿着他的这种思路，郭于华对河北农村进行了深入的个案调查，提出新的时期反馈型代际关系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均衡的代际交换模式已被破坏^[4]。贺雪峰通过对湖北京山县的一个自然村的调查，访谈了该村近 30 余年间自杀的案例，提出了农村老人自杀的四种类型：甘愿型自杀、激愤型自杀、绝望型自杀、孤独型自杀^[5]。陈柏峰通过对皖北李圩村的调查，从价值观变迁的角度研究了农民自杀问题^[6]。杨华则从村庄文化秩序的视角探讨了京山农村的自杀现象^[7]。王跃生主要研究了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过程，并对南方与北方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动进行了质的比较^[8]。以上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大多采用区域比较的方法，较少涉及典型的个案；在研究视角上较少与农村老年群体抑郁症结合起来进行探讨。

事实上，自从涂尔干对自杀的经典研究之后，自杀就不仅仅是一个人对于造物主的反抗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变化问题，一个社会整合问题。中国传统强调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老年人养老的社会关怀能够有效的保护老年人。老年人也拥有较高的礼法地位，能够获得社会影响力。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节奏不断加快，现代化程度不断加深，社会结构变化越来越剧烈，原本的社会关系也随之变化。老年人养老成为一个个人和家庭的问题。根据现有调查发现，老年人尤其是农村自杀人数在逐年增多，而且随着中国老年化社会的趋势不断加强，老年人自杀问题有可能趋于严重。这不是说中国老年人的精神心理有问题，需要调整，而是中国的社会结构整合出了问题，需要做调整^[9]。农村老年人因抑郁自杀的个案研究作为一个社会研究横截面的切入点，在一定程度上能揭示当前中国社会的代际关系问题。在中国老年化社会悄然到来之际，对

中国社会变化的政策调整有所裨益。因此，笔者拟通过解剖麻雀的方法，用社会学和社会工作的视角对一个个案进行质的研究，分析农村老人抑郁自杀的现象背后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农村老人抑郁自杀的个案描述

本案描述的王某生活在鲁西南 A 市北郊的一个自然村，该村是由姜、郑、胡、来四个姓氏组成的自然村。此处临近 327 国道，交通方便，距离市区约 15 公里，在经济和文化上受市区影响较大，尽管如此，民风依然纯朴，村民之间平时互帮互助，人际关系较为和谐。村民精神生活较为贫乏，平时除了串门聊天就是打牌，娱乐活动很少。全村共有 1288 人，其中老人有 169 位，约占总人口的 13.1%。该村长期以种植小麦、玉米、大豆等农作物为主，经济作物主要种植葡萄，全村约 70% 的家庭都有种植，王某家种植面积约为 2 亩。居民收入较低。但自 2002 年以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因为，该自然村因地下有丰富的煤矿存储，2002 年开始被一家国有大型煤矿占用大量耕地，使村民人均耕地由 1.6 亩降为 0.8 亩。随着煤矿的开采，较高的征地补偿金额使该村村民经济收入迅速增加，成了附近几个村庄中较为富裕的村。由于耕地减少，村里男青年大多在城市务工，女青年及身体较好的老人依靠煤矿获得一些收入。由于煤矿开采，不同的人获得的利益差别很大，很多强势的村民则仗势欺压弱势村民以获得更多的好处。总之，自煤矿开采以来，村民之间的纠纷不断，人与人的关系恶化，原来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社会团结机制被打破。很多村民为了利益之争甚至大打出手，有的还吃了官司，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王某，63 岁，家中一儿一女。儿子已婚，并有一幼女，女儿也到该谈婚论嫁的年龄，王某妻子比他小几岁。王某平时话语不多，邻居对他的评价是沉默寡言，很能干，勤劳节俭。王某全家文化水平都在初中及以下水平。家中经济在村中算是中等。王某一直身强体壮，吃苦耐劳，为人憨厚老实，一生以种地为业。辛勤劳动使他积累了一定数量的钱财，而这大部分用于给儿子娶媳妇。但儿子结婚以后其家庭矛盾凸显，主要是儿媳不孝敬老人，经常对老人冷言冷语，爱理不理，有时不喜欢老人的某些行为总会可以刁难老人，甚至辱骂老人。由于共

同居住在一起,平时的生活开销都由老人出钱,儿媳很少问津。王某的妻子照顾小孙女的衣食起居,儿媳不但不感激,还经常不搭理老人。在老人生病需要照料和关怀的时候不但不及时给与照顾,而是漠视,置之不理,这使老人心理受到创伤,造成很大的心理负担。王某唯一的女儿也常常与老人吵架,不尊重老人,且与其嫂子关系也很紧张。王某身体原本很硬朗,没什么大病。可自从儿媳娶进家门,家庭矛盾纠结不断,他不再是这个大家庭的主人。在家里仅有干活和挣钱的份,说话没有以前那么有分量。邻居和过路人整天见他愁眉不展呆呆地坐在儿子家门口的大石头上发愣,也不主动与别人说话,过路人总听见他叹着长气。后来听他的儿媳说,他一直喊着晚上睡不着觉,心中郁闷。时间长了,老人面如灰色,体重剧减,面容憔悴,像得了大病一样。后来,王某到市里大医院检查后才得知患的是抑郁症。王某女儿不懂得到底什么是抑郁症,在她看来只要生理上没什么疾病那都不是什么严重的病。王某儿媳更是以此为借口,认为没有什么大病就去大医院检查,简直是浪费钱财。值得注意的是村民对王某的态度。左邻右舍发现他情绪低沉,总是唉声叹气,但很少有人主动关心他,与他谈心,开导他。相反,当他们得知王某患上一种他们从未听说过的“怪病”——抑郁症时,他们不仅没有给与同情,反而把这当成茶后闲谈。从医院回家一个多月后,王某在自家房梁上上吊自杀。可怜老人辛苦一辈子,竟这样走完了他辛苦的一生。根据调查,王某的母亲生前也是因为跟王某的妻子不合,妻子经常辱骂老人,致使老人上吊自杀,王某是一个孝子,但又十分惧内,老人的过世曾经让他承受力过很大的舆论压力。没想到,王某竟然采用和他母亲同样的方式来终结生命。对于王某的自杀,村民更是议论纷纷,甚至迷信地认为是王某的母亲灵魂附体致使王某自杀。

其实,子女不孝顺是导致王某患抑郁症进而自杀的主要原因,理由如下:一是王某身体一直很好,在此之前没有什么疾病;二是王某生前长期亲历家庭中的矛盾,尤其是其儿媳不尊重老人,经常辱骂老人,并要求老人侍奉自己;三是面对家庭矛盾,受“家丑不可外扬”传统观念的影响,王某愤懑而不能言,只能压在心里,无法发泄心中的郁结进而导致抑郁症,最终因激愤选择自杀。总之,王某属

于激愤型自杀,即王某在采取自杀行为时,其心理状态是激愤的,它反映的代际关系是老人难于接受代际关系的变化,以自杀的行动来谴责儿媳,希望村庄尚存的孝道伦理对儿媳形成压力。

三、农村老人抑郁自杀的社会原因分析

1. 代际关系变化和道德约束力下降

调查发现,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不孝敬老人的现象比较普遍,只不过在农村这一问题更为严重。不孝敬老人的背后折射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农村代际关系的变化和道德约束力下降。

随着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农村社会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代际关系的变迁就属于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工业化和市场化使得年轻人成为创造财富的主力军,老年人却退居其后。改革开放之前,青壮年长年要参加集体劳动,每个家庭都需要老人种菜、烧饭、洗衣和照看小孩,老人是家庭的财富和不可缺少的人。现在,由于化肥和农药的推广、种子的改良、电力和机械的使用,大大减轻了农业劳动的强度,缩短了农业劳动的时间;又由于分田到户,农民可自己安排作息时间,因此,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农忙时间累计不超过2个月,即使农忙季节也不必像大集体那样早起3点半、晚睡10点半、一日三餐到田头,也有时间回家做饭和洗衣,可以不需要老人帮忙。经济地位的变化直接导致老人在家中地位的下降,老人不再具有传统的权威^[10]。同时,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们观念的更新,农村家庭也趋于核心化和小型化,小孩不到学龄就可进幼儿园,需要老人在家照看小孩的时间也大大减少。这无形中让老人觉得自己是可有可无的多余人。再者,传统孝文化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逐渐丧失传统意义上对人们不孝行为的约束力,子女不孝顺父母的道德风险大大降低,没有人会因为不孝顺被舆论谴责不道德或受到实质的精神和物质的惩罚,进而产生“破窗效应”:在麻木不仁的氛围中,不孝顺行为也就习以为常了。最后,农村家庭模式、居住方式变化和生活观念发生变迁。现在农村的青年人形成了两代人的居住偏好,农村青年结婚后一二年都倾向于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喜欢与父母分开过。同时,随着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夫妇相继进入老年,农村老年空巢家庭增长速度加快。许多农村地区也出现了社会学家所观察到的独生

子女家庭“代际倾斜”现象,即青年夫妇只有一个孩子,比较重视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有限的时间、精力和财力都向独子或独女倾斜,从而产生了“重幼轻老现象”。

代际关系变化巨大,但农村老人还是持“养儿防老”传统观念。作为农村老年人,辛苦一辈子,把儿女们拉扯大,可谓艰辛备至。尤其是王某他们那一代人。当年,他们一般有两三个孩子,国家经济又不发达,整个社会处在贫困之中。一般来说,全家大小一日三餐要填饱肚子,需要他们拼命地勤劳节俭。孩子们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又需要他们操心。现在,自己做了爷爷奶奶,还要继续照看孙辈,料理田地。他们从不奢望享清福,生怕给子女带来经济负担。他们唯一盼望的和子女住在一起,生病时子女能够照料。可万万没想到,盼来盼去,盼了几十年的好日子,却由于子女的不孝顺而破灭了。所以,强烈的心理落差使他们伤心致极,郁郁寡欢。由于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文加法盲,不知道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11]。还有的老年人,他们虽然也知道有国家法律可以为自己伸冤,但囿于“家丑不可外扬”的落后心理,总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把自己所受到的所有委屈,全都埋在心里。这样,年复一年,农村老人不知不觉患上老年抑郁症,极端情况下就会自杀。一项关于家庭关系对老年人生命质量的影响的研究证明,家庭和睦的老年人健康自评和生活满意度较好,抑郁症患病率低,反之患抑郁症的比率大大增加^[12]。

2. 缺乏社会支持网络和救助机构

一方面是传统的非正式支持网络日渐式微,如家族影响力在农村社会中日益衰减。在传统农村社会中,老年人的权威不仅是由于他们在经济生产中的经验作用,更有着传统思想和家族势力的保证。如老人一直在宗族中处于领导地位,宗族的大事必须由老人们决定。以往一个家庭子女如果不孝顺老人,或者出现老年人自杀事件,那么作为子女不仅面临着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更直接会受到家族严厉的指责,甚至“制裁”(如责打、孤立、剥夺家庭财产继承权、从家族中开除等)。改革开放前,有经验的老农是生产队的顾问,老人在家庭中受了儿子、媳妇的气可以找社队干部评理,社队干部不仅可以对不孝敬父母的人进行批评教育,而且还可发动社员对其进行批斗。而现在,由于社会转型和经

济生产方式的变迁,使得以“大家庭”、家族作为生产生活组织单位的时代一去不返,生产生活组织的逐渐分散和具体化,带来传统家族观念的日益淡化,加上政府一直以来的宣传和基层组织的作用替代,因而,家族在农村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已变得极为微弱。拿王某所在村为例,王某自杀,即使家族长辈对老年人的死有意见或不满,但也没有任何人或群体出来进行质问或指责,更不要说“制裁”了。村组干部大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从不主动过问老人的生活状况;即使老人找上门,也以清官难断家务事为理由,尽量推托。因此,一些老人受了子女的气甚至虐待,无处申诉,只有一死了之。

另一方面是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和救助体系没有建立和发展起来。除在经济上依靠自己外,农村老年人在生活照料上也大多是依靠自己和配偶。这首先是由于农村地区的社会化养老服务机构不发达,能接纳老年人的养老机构和设施非常有限。虽然各级政府为加快发展民办养老机构,在发展养老机构的资金支持、用地、建设规费、税收、用工等方面先后出台多项优惠政策。但在农村地区,无论是公办养老机构还是私营养老机构,都普遍存在经费紧张、政府经费补贴到位难、水电等收费未全部按民用收费等问题,现有养老机构普遍存在居住环境不理想甚至较差,护工缺少、专业知识欠缺等状况^[13,14]。其次,农村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缓慢也源于农民“天经地义”的家庭养老观念。当前我国农村的养老仍以家庭养老为主,而在王某所在的村,社会养老和集体养老仍是空白。无论是老年人本人还是其家人都认为家庭养老是“天经地义”的,即使有养老院,也很少有老年人去。这主要因为:

- 1) 老年人不愿去。在传统农民世界中,家不仅是提供食物、舒适、保护及老年照顾等徒具物质和经济意义的房舍而已。更重要的是,家更具有社会、意识形态和仪式上的意义。透过家这个实体,农民才能求得时空的连续性,并为自己死亡后的灵魂觅得栖身之所。这种传统思想观念目前还是比较深厚的。在许多老人眼中,进养老院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特别是那些有儿有女的老人,对进养老院更是忌讳莫深,尽管儿女“不孝”将其遗弃,但他们为了保留“面子”甘愿受困吃苦,也不愿进养老院。
- 2) 子女不愿意送。笔者发现,村民对养老院

的理解仍是“可怜人的收容站”、“无可奈何和悲惨的下场”、“家丑”等等，就连那些身在养老院的老年人都这么认为。

3. 人情冷漠，社会关系淡化

人情长期以来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对我国传统社会的发展产生过特殊作用，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至高的地位，注重情感是人情的文化生命基因。随着市场经济的渗入与发展，“情感”型人情逐渐退居次席，“工具目的”型比例不断上升^[15]。当人们越来越考虑人情中的机会成本时，人情就越发淡化，人们的来往就越来越稀少。在一个熟人社会的圈子里，人们之间在清晰地算计利害得失，人情味没有了，人情的淡化意味着自己人的“外化”，自己人越来越紧缩为一个狭小的圈子，比如联合家庭，乃至核心家庭。而这个放在村庄熟人圈中，则是熟人社会的“陌生化”。交往双方的真情实意更多地被表面的虚伪与客套所代替，乃至把感情商品化。以王某所在村为例，该村人际关系的淡化和冷漠令人吃惊。近年来该村村民都忙着挣钱增加收入，而由于村民收入的快速增加，村民之间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分化现象，人们都以金钱为生活的中心，相应的社会风俗和习俗出现简化的趋势。譬如，以往遇到红白喜事大多在村里很隆重举办酒席，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都来义务帮忙，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其乐融融。而现在直接到酒店象征性地吃一顿饭，仅此而已。几年前村里农户建房子是请“自己人”帮忙，不用支付工钱，只管伙食。最近村民普遍将把所有的事情都承包给施工队，而不再“自己人”帮忙。原因是农民朋友在经过仔细算计之后，认为“管伙食”与请施工队的费用差不多，但请亲朋来帮忙还有个“人情债”在里头。与其去欠这个“人情债”，还不如让施工队给解决掉。

调查中我们了解到，除仪式性人情的弱化外，农村日常性人情(指人们在村落生活、生产和交往中人情亏欠与偿付)也日渐淡漠。日常性人情讲究的是在村庄中的小事情上的人情记忆、亏欠和偿还，生活中人们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言谈都富含深刻的人情内涵。日常性人情使人们的生活能够充分而富余弹性，使人们的交往除了檐边谈话、串门、门楼打牌、饭场等公共生活外，还有许多私人(人数、家庭不限)的互助、合作、帮忙、转借、搭伙、劝架、探事、壁脚、围观、点拨、开导、调解、撮合等等

密集的交往方式，使人们被这样的细小琐碎的人情交织在一张网内，一人之事即网络之事^[16]。最为关键的是，日常性人情是地方性共识、规范和伦理的生成、强化、援引及实践机制，它濡化人们、教化后来者(刚结婚的年轻夫妇)、规训越轨者，人们在日常人情中知道哪些应该做，哪些做得不对，哪些是有意义的，而哪些又是被人们普遍所接受的。日常性人情强化已有的村落生活规范和生活共识，过滤和产生新的规则。如十年前，该村一泼辣媳妇一向对公婆不孝顺，一日其向某老先生家借鸡蛋做人情，老先生恼火，不借；农忙时，又是此人，在村落里叫人帮忙给她家割稻谷，连其堂弟媳妇和堂婶都推脱说早有人请了，没空，无奈二十里路外请娘家家人来帮忙；整个村落对该户不太感冒，她要借什么锄头、镰刀、粪箕、水泵、打谷机等都说没有，或在用，杜绝与其人情来往；平常的妇女联合活动也没有她的身影，等等。这样的事情多了，她自己感觉不太妙。经村里几个老婆婆开导后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不对，后来开始对公婆转变态度。而随着市场化经济的到来，乡村的固有观念、集体情感和日常性人情交往受到严重冲击，使得农村社会变得冷漠，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旧的价值体系和集体情感正在瓦解，新的社会价值体系和规范并未确立。现在，村落共同体中的违规(不孝顺、不遵守村规民约)者不再会被排斥在人情圈之外，大家对此已经熟视无睹了。

综上所述，王某抑郁自杀行为反映的是农村社会代际变迁、社会公共服务欠缺和乡村传统文化没落的问题。

四、社会学视角下农村老人抑郁自杀问题的应对策略

1. 重建人们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感

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人们对其从情感上就很容易接受和认同。但在传统道德弱化的趋势下，不能仅仅复古传统道德规范，还要结合时代的需要，在此基础上科学整合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重建一种融合传统文化和现代元素的道德规范，使之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的行为准则。没有传统文化，道德意识就成为无源之水；没有结合现代元素，道德意识就成为纸上谈兵。具体而言，要倡导建立一个互相关爱、充满温暖的和谐社会，发扬孝敬老人、善待老人的优良传统，提倡孝文化，对孝敬老人的现象要

加以表扬和鼓励,对于不孝敬父母的青年给予道德上和舆论上的监督。

2. 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

经济上的保障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前提,在农村老人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的前提下,农村养老保险自然应成为老年人生活的保障^[17]。在现有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大背景下,大部分的农村老人年老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这不仅直接影响了他们晚年的生活水平,也束缚了他们的活动范围和社会参与度,进而使他们晚年精神生活单调、乏味,不能使他们有一个幸福充实的晚年。在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背景下,社会化养老的呼声就越来越高。近年来,随着我国老龄化速度的加快,社会各界都致力于探索适合国情的社会化养老方式,就是基于对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现状的考虑。这就需要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断提高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让老年人也能分享社会经济成果。这也是一个二次分配的过程,通过再分配实现社会的公平。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体系,把老人纳入社会养老的范畴,解决老人经济上的问题,让老人减少对子女经济上的依赖。此外,还要积极完善农村医疗保障体系,解决老人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让老人不至于因看不起病自杀。

3. 建立专业化的社会服务机构

建设服务型社会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建立专业化的社会服务机构,诸如社会工作机构的服务组织能深入农村社区,通过开展活动,调动社区、社会、家庭和个人等各种资源,协助农村老年人摆脱困境,并实现其成长。农村社会工作可以开展各种有针对性的专业服务来满足农村老年人的需求。但目前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相对滞后,而现实社会需求又很迫切。因此,应积极发展诸如社会工作性质的农村社会服务组织,培养专业服务人才,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具体而言,可以在农村村官人才结构中配备一名社会工作方面的人才,加强其支农、服务三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一方面缓解了社会工作在当下中国的尴尬局面(社会一方面急需社工人才,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体制机制的制约,社会又没有提供专业对口的社工岗位),另一方面又实现人尽其才,服务农民的社会效果。要加强社会工作

机构和农村社会工作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把社工人员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转介到专业机构处理。同时,还要建立社会工作机构与政府部门、法律部门以及农村基层组织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关系,加强社会工作者对农村家庭的介入和服务,切实建立一个务实、高效、专业的农村社会支持网络和服务平台。

参考文献:

- [1] 胡志,陈若陵,徐晓超.农村社区老年抑郁症患病率影响因素调查[J].中国公共卫生,2007(3):257-258.
- [2] 龙理良,陈新,赵英.农村社区老年人抑郁状况及对生命质量影响[J].中国公共卫生,2007(3):266-267.
- [3] 费孝通.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3):5.
- [4] 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J].中国学术,2001(1):80.
- [5] 贺雪峰.家事纠纷中的农村妇女自杀[J].社会学研究,2009(4):8.
- [6] 陈柏峰.价值观变迁背景下的农民自杀问题[J].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 [7] 杨华.自杀秩序与湖北京山老年人自杀[J].开放时代,2009(5):98.
- [8] 王跃生.中国农村家庭的核心化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07(5):58.
- [9] 孙治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中国农村的老年人自杀调查[EB/OL].孙治方公共政策研究网,2010-01-24.
- [10] 吴磊.农村老年人自杀因果的社会学分析[EB/OL].中国乡村发现网,2008-10-06.
- [11] 王习明.试析世纪之交农村老人自杀增多的原因——以荆门为例[EB/OL].西部农村研究网,2007-02-11.
- [12] 汤哲.社会家庭因素与老年人生命质量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老年学杂志,2009(9):11-28.
- [13] 侯志阳.农村养老困境与乡村“草根”型养老模式构建[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1):46-49.
- [14] 梁兆辉,郝云涛.老年人群心理健康与个人收入相关研究[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0(10):14-16.
- [15] 胡双喜.农村人情现象解析[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6):55-60.
- [16] 杨华.农村人情的性质及其变化[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8(1):59.
- [17] 和敏娟,吴明.老年人社会资本量与社会支持提供机制[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0(12):17-23.

责任编辑:陈向科